

JINGXUE SHIYE XIA DE
SHIJI YU
ZHOUYI CHUNQIU

经学视野下的 《史记》与《周易》《春秋》

叶文举◎著

经学视野下的 《史记》与《周易》《春秋》

叶文举◎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装帧设计:陈 爽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视野下的《史记》与《周易》《春秋》/ 叶文举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76-1999-9

I. ①经… II. ①叶…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915号

经学视野下的《史记》与《周易》《春秋》

叶文举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2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999-9

定 价:23.5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摘 要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论赞中写道：“《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太史公认为《春秋》与《周易》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系。而司马迁本人认为自己撰写的《史记》是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太史公自序》）。从学术思想而言，《史记》与《周易》《春秋》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受到了《周易》《春秋》的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家学渊源，而司马谈受教于注重大谊主旨的杨何易学，在司马迁身上能够看到杨氏易学的影子。《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宗旨，接受了《周易》“通变”思想的影响，其“观古今之变”“协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和《周易》“变易”“易简”“不易”三个层次之间保持着对应的关系。司马迁通过历史事件的记载鲜明地透露历史“长于变”及“其所由来者渐矣”的渐变思想，提出考察历史要“见盛观衰”。司马迁接受《周易》“终则有始”的思想，提出认识历史要“综其终始”，《史记》甚至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受到《易经》卜筮传统的濡染，《史记》记录了诸多的卜筮、相事，而且司马迁都表示了信服的态度。当然在卜筮之外，太史公更相信德性的重要性，也反映司马迁在天命与人事两者关系认识上的矛盾。《太史公自序》提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司马迁在《天官书》中探讨了天运之变与人事变动之间的关系，有“天人感应”的倾向，但同时也强调德性在天人关系上的重要性。在人生观上，《史记》所表现出的“立功名于天下”“见几而作”“谦让”“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等人生的诸多品格在《周易》思想中都能找到深刻影响的因素。《外戚世家》所提出的“《易》基《乾》《坤》”观念对司马迁夫妇伦理观影响甚大，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说，夫妇关系处理得当与否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周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的交换观念对《史记》的经济思想影响甚大，这在《货殖列传》《平准书》等传记中有鲜明的反映，但司马迁在当代功利性非

常浓重的情境下,又提出了“以礼义防于利”。《周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又成为《史记》论学、论治、论术的重要方式,同时《史记》运用较为繁富的《易》语来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①,《周易》的忧患意识也渗透在司马迁《史记》的编撰过程之中。司马迁从《周易》中吸收营养,形成自己的独特史观。

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的使命感来要求自己编撰《史记》,其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提出的关于《春秋》的一些观念在《史记》文本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在《史记》中表现为对王道核心的“德”“礼”的推崇,特别是司马迁提出“亲民”“礼让”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表明司马迁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基调。司马迁认为《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史记》继承《春秋》经世致用的思想,其“劝善惩恶”的理念、“刺讥”的精神,都表明《史记》的编撰是“述往事,思来者”,可以成为“百王大法”。司马迁继承《春秋》“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的笔法并加以发展,尤其从“君子曰”形式到“太史公曰”形式的发展,在传中人物的安排以及篇目的设置上,《史记》表现出子书的鲜明特性。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叙事中有所寄托,但《春秋》叙事较为简单,《史记》在纪事上更为繁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思想主要寄托在纪事之中,形成了“于序事中寓论断”的特点:叙小事,以见大处;实录其言行,以见其人;以事例对比,彰显其旨;重点人物与事件不断关注;“重言”使用;借助传中其他人物的言语来评价人物;等等。这形成其“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多重具体方式。相对于《春秋》而言,司马迁的《史记》个人主体性更强,主要原因是“发愤以抒情”思想的渗透。

从司马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的作史目的来看,《史记》的精神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史记》实际上是一部特殊形态的思想著作(经书)。它秉承先秦的学术传统,整合百家思想,自铸伟辞,以演变的历史和人物的活动为载体,以文学的样式为表现手段,阐明关于治乱规律的认识和对天人之际的反思。

^①《史记》称《周易》为《易》,为了行文方便,本书有时将《周易》简称为《易》。

目 录

摘 要	1
绪 论	1

上 篇 《史记》与《周易》

第一章 《史记》与正《易传》——兼论司马迁的易学渊源	5
第二章 《周易》对《史记》“通古今之变”修史宗旨的影响	8
一、“变易”与“观古今之变”	8
二、“易简”与“协古今之变”	20
三、“不易”与“通古今之变”	24
四、余 论	30
第三章 《周易》对《史记》“究天人之际”修史宗旨的影响	31
一、“盖若遵厌兆祥”——《周易》与《史记》的卜筮	31
二、“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周易》与《史记》中的星气、天官	42
第四章 《周易》对《史记》人事活动记载的影响	48
一、“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史记》人生观与《周易》	48
二、“《易》基《乾》《坤》”——《周易》与《史记》夫妇伦理观	60
三、“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周易》与《史记》经济思想	65
第五章 《史记》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所用《周易》法与《周易》语考	69

下 篇 《史记》与《春秋》

第六章 《史记》与“继《春秋》”——兼论司马迁的《春秋》学思想	75
第七章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79

一、《史记》之前关涉“王道”的学术史考察	79
二、《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一:非“武”	82
三、《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二:重“德”	83
四、《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三:尊“礼”	93
第八章 从“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到“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对《春秋》著史动机的继承与发展	100
一、“劝善”“惩恶”的思想	100
二、“刺讥”精神的继承	107
三、“刺讥”之外:美化	114
第九章 从“微言大义”到“成一家之言”——《史记》所潜藏的子书特性	116
一、《史记》对于《春秋》“一字寓褒贬”的继承与发展	116
二、从“君子曰”等形式的沿袭到“太史公曰”形式的发展	120
三、《史记》传中人物的安排带有子书所表现的思想因素	123
四、《史记》篇目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其思想的内涵	126
第十章 从“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到“于序事中寓论断”——《史记》对《春秋》著史方法的传承与发展	128
一、叙小事,以见大处	129
二、实录其言行,以见其人	131
三、以事例对比,彰显其旨	133
四、重点人物或事件的持续关注,以明太史公之立场	136
五、“重言”的频繁使用,藉以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感	138
六、借助传中其他人物的言语来评价人物	143
第十一章 《史记》对《春秋》其他方面的发展	147
一、“发愤以抒情”的渗透	147
二、五体架构:修史体例的改变	152
结 语	156
主要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68

绪 论

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要绍继并效法孔子作《春秋》^①,司马迁的心灵深处一直蓄积着做第二个孔子的理想。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春秋》的内容、作用与精神,“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②。而在孔子那里,《春秋》与《周易》又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③《论语·述而》则载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④邢昺疏:“孔子言己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咎矣……至五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孔子思想之所以出现飞跃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对《周易》的学习。《周易》对孔子的哲学、科学、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孔子在《易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使之由卜筮之书变成了一部哲理之书^⑤。后来才作《春秋》,“子曰:‘……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⑥。司马迁多

① 甚至有人认为司马迁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也是遵守孔子的精神,如清人李晚芳谈到太史公剪裁史料时说道:“序三代而以五帝陪起,盖三代皆出五帝也。通篇以阙疑慎传为骨,以孔子论次为宗,以殷以前之略,陪起周以来之详。夫子所‘弗论’者,固不敢妄增,即经夫子所序,亦阙则从阙,不失及见阙文之意。讫于共和,仍以五帝带结。寥寥短幅,不过百三十余字,亦具如此章法,如是结构,立论措辞,不离孔子家法。宜《史记》继麟经,而千古不磨也。”(李晚芳:《三代世表序》,《读史管见》卷一,见于《李慕猗女史全书》,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6页)

② 司马迁撰,裴翊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③ 《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7页。

④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页。

⑤ 关于《十翼》是否为孔子所作,争论较大。孔颖达云:“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我们暂取孔子作《十翼》之说。观《左传·昭公二年》知《易》与《春秋》皆掌于鲁太史,所以孔子有足够条件对《易》与《春秋》进行推衍和整理。

⑥ 《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3页。

次揭橥《周易》对《春秋》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的赞语中写道:“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①《易》探讨宇宙运行的宏观大道,孔子则将它运用到历史中去观察春秋时代历史兴亡的变化而作了《春秋》,也就是说,《春秋》是把天道接应到人事上来,对天道在人事层面的表现做了具体的考察。《太史公自序》又说:“《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②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后面的赞语中写道:“《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③从表面上来看,《春秋》是史学著作,《易》是哲学著作,两者似乎没有关系,但《司马相如列传》最后的论赞明显是在向我们传递《春秋》与《易》的内在关系问题。司马迁认为,史学与哲学是可以相通的,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一个彰显、一个隐晦而已。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韦昭语:“《易》本阴阳之微妙,出为人事乃更昭著也。”并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④《春秋》通过人事的记载,隐含了天道的内容,人事不过是天道的表象,而《易》是讨论天道的,却是由人事来显现,《易》只是做了深沉的隐括而已。用我们今天的哲学理论术语来说,《春秋》是形而下的,《易》是形而上的。《春秋》和《易》一样都包含了天道的内容,两部书正是表里的关系,都一致指向天道。所以在司马迁看来,《春秋》绝对是经学著作,而不单纯是史学著作,其中蕴涵了深刻的经世之道。换言之,《周易》主要讨论宏观宇宙运行的大道,孔子则把它运用到历史中去考察春秋时代历史兴亡的变化并编撰《春秋》,他把天道接应到人事上来进行具体的考察。司马迁本人可以说正是在领会孔子所编《春秋》与《周易》之间内在的深刻关系基础上编撰《史记》并以此为指导,由此《史记》与《周易》之间产生深层的内在关系。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史记》文本来探讨《史记》与《周易》《春秋》之间的深层关系。

①《史记》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3页。

②《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③《史记》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73页。

④《史记》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73页。

上 篇

《史记》与《周易》

第一章 《史记》与正《易传》

——兼论司马迁的易学渊源

考察《周易》对司马迁《史记》编撰的影响,前提是司马迁本人是否接受了易学思想的濡染,因此本书首先讨论的是司马迁的易学渊源问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曾说:“太史公(笔者按:这里指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①他父亲的易学知识是源于菑川人杨何的传授。司马迁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对父亲非常尊敬,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文化教育。他接受了父亲的熏陶,并承续父亲未尽的著史事业,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②。父亲所接受的杨何易学无疑会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父子两代同传杨何易学。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曾特别交代了孔门易学传授的统系,“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③。在司马迁看来,杨何是孔子易学正宗而唯一的传人。杨何是司马谈的直接易学老师,自己也就名正言顺地接受了正统的易学教育。康有为曾说:“《易》不经焚为完书,上自商瞿为嫡派,下至田何、杨何,太史迁为杨何再传弟子,其为孔子之传尤确矣。”^④康氏认为司马迁和孔子易学之间保持了醇正的传承关系,作为司马迁易学师祖的杨何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直接影响了司马迁的易学思想,故而我们首先从杨何其人其学谈起。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8页。

② 《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6页。

③ 检阅《仲尼弟子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在这一传记中只交代了孔子《易》学的传授过程,其他五经的传授均未交代,从中我们也可见司马迁对《易》学的重视程度,司马迁的《易》学也带有家学的意味。请参见《史记》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11页。

④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

《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在秦始皇禁毁书籍之列。《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下令焚书的状况时写道:“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①很显然,《易》的流传并未受到多少人为因素的阻隔,没有遭到如同其他儒家典籍被禁毁的命运^②,故一直比较单纯地流传到汉初。

因此班固《汉书·儒林传》认为:“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③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再次写到汉代易学的传承情况:“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④(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杨何者,大抵与汉武帝同时,《汉书·艺文志》记录说他有《易注》两卷。从《儒林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杨何当时影响之大,汉代说《易》者都潜在地受到杨何易学思想的濡染。在司马迁看来,汉时易学的传授,根柢都应当源于杨何,杨何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易》作为五经之一,武帝时之所以能够设立博士,完全应当归功于杨何。清人王先谦认为:“武帝立五经博士,《易》惟杨何。”^⑤

可惜杨何的《易注》两卷现在已经亡佚,因此我们很难体察到杨氏本人易学思想的具体内涵。班固说:“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⑥尽管我们同样不知田何的易学到底有怎样的特点,但丁将军(宽)的易学特征,我们却能有所了解。《汉书·儒林传》写道:“(宽)作

①《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

②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事起。“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255页)卜筮之书不在烧毁的范围之内,当然包括《易》在内。故《隋书·经籍志》说:“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12页)

③班固撰,颜师古注:《儒林传》,《汉书》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页。

④《史记》卷一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7页。

⑤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6页。

⑥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1页。

《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其大谊而已^①，今《小章句》是也。”^②由此推知，杨何的易学特点大抵也是较注重于大谊主旨，解说平实通达，不拘泥于琐碎的文字章句注解。从司马父子和杨何易学的传承关系来说，司马氏的易学思想应该同样具有这样的特质。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自己著史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③。他立志要对前代学术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批判、总结。他自以为是孔门易学的嫡传，《太史公自序》中的“正《易传》”之言充满严肃的责任感，《周易》内在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史记》的编撰。

① 颜师古注曰：“故，谓经之旨趣也。它皆类此。”（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也就是说，丁宽对《易》的解说，只是着眼于《易》的经义大旨，并不拘泥于琐碎之言，旨意较为通脱。

② 《汉书》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3598页。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9-3320页。

第二章 《周易》对《史记》“通古今之变” 修史宗旨的影响

《易纬·乾凿度》论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①易学也就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所谓变易，指世间万象，没有不变动不居的；所谓不易则是从至变中，得其不变之则；所谓简易，是从极复杂的现象中求得一种统驭于极简单的原理^②。实际上，司马迁所讲的“古今之变”也有三个层次：“观古今之变”“协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他要极力从历史演变中“察其终始”“谨其终始”“综其终始”。（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没有采用“始终”这一个概念，而使用了“终始”一词，因为“终始”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事物由结束到开始再到结束又到开始这样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下面我们具体谈谈这三个层次的变化与《周易》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变易”与“观古今之变”

（一）“长于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他与壶遂争论时曾说过“《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③，阐明了《易》“变”的特点及其成因。司马迁认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本身就有多样的变化，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天运、天变、天数，《天官书》《律书》等就详尽地记载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诸种变化的现象，司马迁依此推导出《易》本身就记载了关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变化的诸多道理，具有“长于变”的特点。《太史公自序》又

① 参见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② 具体内涵请参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77页。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说:“《易》以道化。”^①同样传达了《易》讲究变化的哲理。司马氏在《滑稽列传》又引用了孔子的话“《易》以神化”^②,也表达了《易》“长于变”的观点。当然,这样的思想并不是司马迁的独创,它无疑和《易》“变”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易》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变”,《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③变化是世界万物的普遍法则,唐代孔颖达总结《易》的思想精髓时说道:“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④正因为有了变化,世界才有纷纭的万象和动态的发展。

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时候隐含了“长于变”的易学思想,换言之,“长于变”的思想对其创作《史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变”是他考察历史事件的一个指导原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宗旨,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长于变”的易学认识。《太史公自序》还说:“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⑤;“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⑥;“作《平准书》以观事变”^⑦;“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⑧。“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⑨“变所从来,亦多故矣”^⑩等也多次表明了司马迁易学中“长于变”的思想。所以一部《史记》主要是“天变”“时变”“人变”“事变”等诸多变化的形象记载。

泛而言之,司马迁“长于变”的观念反映到现实中主要有两层考察:一是物事的变迁。如《平准书》中在谈到物价的变化时说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

①《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7页。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7页。

③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④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⑤《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4页。

⑥《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5页。

⑦《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

⑧《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9页。

⑨《高祖本纪》,《史记》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4页。

⑩《郑世家》,《史记》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77页。

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①二是人事的变迁。因为下文要详细讨论，这里姑且不再详述。

事物发展总是在矛盾中进行的，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某些原来正确的方面必然会出现弊端，就必须加以改变，司马迁常常严厉批判那些“不合时变”“不知时变”的人。如他非常肯定变法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在描述符合民意的变法时往往不惜泼墨如水，详尽地描绘变法的进程，他强调时代前进，法制必然要随着变更，变法就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商鞅之变法等，都是前进对守旧、变法对因循的胜利，司马迁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②可见变法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司马迁为何要给“取人多暴”的秦王朝予以充分的肯定，正是所谓的“世异变，成功大”^③。司马迁所设立“表”的体式，用意之一正是以谱牒的形式全面展示社会的变迁、人事的变化，如他在谈到编撰《六国年表》时说道：“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

①《史记》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2-1443页。

②《商君列传》，《史记》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9页。

③《六国年表》，《史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86页。